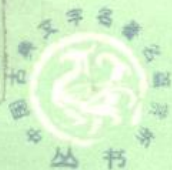




战国策名篇赏析

蓝开祥 著



战国策名篇赏析

蓝开祥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京) 新登字204号

战国策名篇赏析

zhan guo ce ming pian shang xi

蓝开祥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京辉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3印张 277 000字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

ISBN 7—5302—0139—5 / I·138

定价：5.10元

作者介绍

蓝开祥，广东省平远县人，1932年6月生，1956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后留校任教，三十多年来一直从事先秦文学的教学与研究。现为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理事。著有《先秦寓言选》（与人合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哲学寓言故事选》（与人合作，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等书，并发表了《东西辉映的先秦寓言与伊索寓言》等有关中国古典文学、古代寓言的论文多篇。

《战国策》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文学和史学名著。本书共选《战国策》61章（篇），所选都是思想内容健康、艺术完美、有借鉴意义的脍炙人口的名篇，如《司马错论伐蜀》、《扁鹊见秦武王》、《邹忌讽齐威王纳谏》、《冯谖客孟尝君》、《鲁仲连义不帝秦》、《触龙说赵太后》等。

本书对《战国策》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作了精辟的分析和公允的评价。对入选名篇作品，都放在当时广阔的历史背景上进行考察，并针对内容的不同，分析各有侧重：如以突出人物形象为主的，着重分析如何塑造人物；以议论为主的，着重分析议论文的特色；以记叙为主的，着重分析矛盾冲突中情节的发展等。本书对读者学习和研究先秦文学和史学有很大帮助，并可为文艺创作和写各体文章提供有益的借鉴。

前 言

《战国策》是一部文学价值相当高的重要史籍，它上承《左传》、《国语》，下启汉代的《史记》，在史传文学的发展史上起了桥梁作用，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依据之一；作为文学作品，它标志着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给后世散文和辞赋的创作以重大影响，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取要的地位。宋人姚宽《战国策后书》指出司马迁的《史记》直接取材于《战国策》的有“九十三事”。如《苏秦列传》、《张仪列传》、《樗里子甘茂列传》、《穰侯列传》、《白起列传》、《孟尝君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魏公子列传》、《春申君列传》、《范雎蔡泽列传》、《乐毅列传》、《鲁仲连列传》、《吕不韦列传》、《刺客列传》等，就是明显来自《战国策》的。《史记》还多方面得力于《战国策》体情状物的淋漓酣畅的写作技巧。宋代散文家苏洵、苏轼受《战国策》的文风影响很深。苏洵的《六国论》中某些语句是从《苏秦为赵合纵说韩王》活化出来的。后代的辞赋也可以从大量使用骈辞丽句的《战国策》找到渊源关系。对于《战国策》一书的艺术成就，历来评价颇高，有人说它“辩丽横肆，亦文辞之最”，并非过誉。

《战国策》不是出于一人之手，当是战国游说之士各有所记，有的还是后人根据历史传闻写作的，比如苏秦、张仪合纵连横的许多说辞中有不少就是后人拟托的东西。秦、汉间人蒯通曾“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史记·田单列

传》),应该说他是最早的编撰者之一。到西汉末年刘向进行整理时,尚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脩书》等多种书名,最后刘向按国别体编排,共得三十三篇,定名为《战国策》,它记述了战国二百四五十年间的大小历史事件。东汉高诱为之作注,流传到北宋,又有缺佚,曾巩做了修补重编的工作。南宋姚宏续注,称姚本;鲍彪作注,称鲍本。元代有吴师道的补正。清代有黄丕烈的《札记》。近人金正炜著有《战国策补释》,钟凤年著有《国策勘研》。

二

战国是一个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基本特点是:一,随着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封建的生产关系日益巩固。此时不但农业、商业、手工业有了越来越明显的分工,而且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分工,出现了庞大的知识分子群——士阶层。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二,韩、赵、魏、齐、楚、燕、秦七国先后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封建法制的改革,如魏国李悝的变法、秦国商鞅的变法、楚国吴起的变法、赵国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齐国邹忌改革弊政等,都产生了很大的政治效果。其中特别是商鞅变法,搞得比较彻底,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由春秋推进到了战国时代,旧时所拘守的儒家那套仁义道德观念已宣告解体。正象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所言:“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绝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

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会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日知录》）。四，战国七雄为了自身的安全或推进统一事业，都千方百计罗致士阶层中的各种人才，一时“养士”成风。而士阶层人物为了能够“进身”，建功立业，也展开了激烈的智力竞争。这就是谋臣策士成为当时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力量力量的原因。这些谋臣策士来自各个阶级、阶层，包括众多的学派，而纵横家苏秦、张仪是其中重要的一派。五，这一整个时代，从表面看是战乱纷纷，而从实质看，则是由分裂趋向统一。所谓“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是对当时政治形势的概括。斗争的结果，六国合纵的阵线宣告失败，秦国的连横策略取得了成功，最后由秦王政实现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战国策》的不朽思想价值，就在于它的主要思想倾向随着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广泛反映战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活动，为当时的新兴力量——士阶层中的许许多多谋臣策士立言立传，突出表现他们的奇策异智，表现他们在政治舞台上所发挥的巨大能量。所谓“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就是对他们的政治作用的恰当评价。

南宋的晁公武在其《郡斋读书志》中曾将《战国策》归入“纵横家类”，实际是以偏概全。这是因为该书虽然有纵横家苏秦、张仪的大量说辞，有的地方还对他们作了不遗余力的颂扬，比如《秦策·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中对于苏秦的颂扬就是例子；但是，纵横家只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家，它并不能代表整部《战国策》。整部《战国策》的思想内容是丰富复杂的，认识不清楚这个问题，就会错误地拿对纵横家的评价代替对整部《战国策》的评价，导致贬低甚至完全

否定《战国策》的思想价值。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東西。”（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如果我们尊重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战国策》的思想内容中有很多有价值、有历史进步性的东西。

一部《战国策》，不愧是人才学思想的宝库。《战国策》正反映了战国这个特定时代对人才的呼唤。在冲破列国藩篱交流人才、不拘一格延揽人才、伯乐识骥引荐人才、互相论辩造就人才、论功行赏奖励人才等各方面，都总结出了很多有益的经验。“伯乐识骥”的故事，最早就出自《战国策》。齐人淳于髡，一天之内就荐七士给齐宣王，宣王奇怪人才何其多，淳于髡便自称是“贤者之畴”，说：“王求士于髡，譬若挹水于河，而取火于燧也。髡将复见之，岂特七士也！”够得上是一位伯乐式的人物。一次苏代要去见齐湣王，先找了淳于髡，淳于髡乐于引荐，苏代果然受到了湣王的大大赏识。鲁仲连意识到“猿猕猴错木据水，则不若鱼鳖”，认为人都有所长有所短，“舍其所长，之其所短，尧亦有所不及矣”。这真可说是在人才问题上的真知灼见。

“士贵而王者不贵”的思想，是战国时代士阶层地位普遍提高的集中反映。旧时所谓“王者贵而士不贵”，是从权势地位的高下讲的；新的提法，认为“士贵于王者”，那是就士阶层在当日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言的。“得士则兴，失士则败”，已为许多历史事实所证明，因而不少有政治远见的君王（如燕昭王、秦昭王）、贵族（战国四公子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等），用“礼贤下士”的谦恭态度去延揽谋臣策士。《战国策》表

彰了这新时代的新人物、新思潮。

“重利而轻忠信轻仁义”的思想，《战国策》中表现得很突出。在苏秦看来，“忠信”、“仁义”之类，“所以自为也，非所以为人也，皆自覆（自护其名）之术，非进取之道也”。（《燕策·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它表明忠信、仁义一套儒家的旧观念已经过时，不能适应战国这个急剧变革时代的要求。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更加注重现实、注重实际利益的思想。这时期在各种政治斗争场合，人们已把春秋时挥舞过的“仁、义、礼、智、信”等温情脉脉的政治外衣抛弃，而赤裸裸地谈利害得失。为《战国策》称道的吕不韦曾是个大商人，他认为耕田之利“十倍”，珠玉之赢“百倍”，不及立国家之主其利“无数”。这是“言利”的典型。（《秦策·吕不韦贾于邯郸》）这种以利为先的观念，激起了社会各阶层、各政治集团之间的剧烈竞争。这种竞争更迅猛地推动着政治、经济的发展，推动着社会在更大范围内的融合。而历史的变动又反过来促进人们观念形态的深刻变化。

“改革弊政，富国强兵”的思想，在《战国策》中所在多有。邹忌讽齐威王纳谏，颁布了一套广开言路的命令，收到了“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的功效。鲍彪《战国策注》认为邹忌讽谏之言，乃是“万世之言”，能长久地供后人借鉴。商鞅辅佐秦孝公变法，“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使得“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赵武灵王在谋臣肥义的支持下，实行“胡服骑射”，是政治上、军事上、习俗上的大胆革新。史学家葛伯赞曾评论：“我说赵武灵王是一个英雄，不仅仅是因为他修筑了一条长城，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敢于发布‘胡服骑射’的命令。要知道，他在当时发布这个命令，实质上就是与最

顽固的传统习惯和保守思想宣战。”“赵武灵王击败了那些顽固分子的反抗，终于使他们脱下了那套用以标志他们身份的祖传的宽大的衣服，并且把过了时的笨重的战车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内蒙访古》）范雎针对秦国的弊政搞改革，打破了朝廷“四贵专权”的局面，在统一的步骤上变“近交远攻”为“远交近攻”，从而大大加快了秦统一六国的步伐。

“爱国主义思想”，在《战国策》中已增加了新的含义。爱国主义本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内容。我们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是经历了长久的融合过程的。历史发展到了七雄并争的战国时代，由于总趋势是由诸侯分裂割据的状态一步步走向统一，人们的爱国观念的视野便自觉不自觉地随之扩大。《楚策·庄辛说楚襄王》，写庄辛以“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的含义深长的话，告诫顷襄王在国家危亡之际重振旗鼓，其爱国思想是感人至深的。《赵策·触龙说赵太后》，写触龙在国难当头时，劝告赵太后让小儿子长安君为国立功，明于大义，同样是很感人的。这里应指出，《战国策》除写这类人物的爱国思想外，更多地还表彰了“晋才秦用”式的人物。这一类人往往不为他们原有的狭隘国家观念所局限，适应人才流动的形势，到异国去发挥聪明才智，在统一中国的大业中立了大功。比如商鞅、范雎、蔡泽、吕不韦等人，都是属于这一类型的。

“民本主义思想”，也包容在《战国策》中。《齐策·赵威后问齐使》所写赵威后的“民本君末”思想，在“民”与“君”的关系上提出了新的看法，将“民”置于“君”之上，这与同时代的儒家大师孟子所言的“民贵君轻”思想是一致的。民本主义思想最早产生在西周初年，当时提的是“敬

天保民”，“敬天”和“保民”被置于天平的两头，处于均衡的地位；到了春秋，提的是“民为神之主”，将“民”置于神之上；再到战国，便有赵威后的民为邦本的思想。这不是历史的重复，而是每向前发展一步，民本主义思想显然打上了新的时代烙印，增加了新的内容。从民本主义思想的产生、发展来看，它是由一些有政治远见的政治家们提倡的，提倡的人虽是站在维护当时统治者的长远利益的立场上讲话，但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了人民力量的不可轻视，还是有历史进步性的。

“歌颂真善美，反对假恶丑”的思想，贯串在《战国策》全书中。它一方面颂扬了封建统治阶级在上升时期的进步作为，另方面又对他们的残暴贪婪、奢侈腐化、昏庸无能、目光短浅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嘲笑。如对利令智昏而导致自身灭亡的知伯，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作者说：“知伯身死，国亡地分，为天下笑，此贪欲无厌也。夫不听知过，亦所以亡也。”（《知伯自取灭亡》）揭露了秦国的统治者对韩、魏的摧残：“韩、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百世（当依《史记》作十世）矣。本国残，社稷坏，宗庙隳，刳腹折颐，首身分离，暴骨草泽，头颅僵仆，相望于境；父子老弱系虏，相随于路；鬼裒狐祥无所食，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黄歇使秦说昭王》）活画出了一幅幅家破人亡的惨景！《张仪南见楚怀王》，则揭露了楚怀王的昏庸无能。作者说：“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仅以救亡者，计失于陈轸，过听于张仪。”把误国误民的责任，归咎于楚怀王的糊涂。《庄辛说楚襄王》，无情揭露了顷襄王“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的腐败状况。

从以上几个重要的侧面，已足以看出《战国策》是一部思想价值很高的书。旧时代的好多学者常常拘泥于用儒家的仁义道德观念去评论是非，因而导致对这部书的思想价值的完全否定或基本否定。如宋人李格非说：“《战国策》所载，大抵皆纵横捭阖、谰诌相轻、倾夺之说也，其事浅陋不足道。”

（《书战国策后》）叶适也认为，十之七八都是“佞陋浅妄之夸说”，“使与道德礼义相乱，其为学者心术之巨蠹甚矣。”

（《习学记言》）这些观点，既不能正确评价纵横家，也不能正确评价《战国策》整部书的思想内容，其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

无庸讳言，《战国策》的思想内容也确有局限性：

（1）有些地方过多渲染了“尔虞我诈”的明争暗斗。曾巩说“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吴师道说“相诈相倾，机变之谋，惟恐其不深”，朱鹤龄说“朝纵暮横，阳施阴设”，陆陇其说“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心术”，这些东西，《战国策》中的确是不少的。问题是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同时，对于“诈术”也还应作具体的分析。如果从军事学的角度谈问题，自古就有人们所公认的“兵不厌诈”的说法。而《战国策》中的纵横家苏秦、张仪，正是作为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事家来表现的。《淮南子·览冥训》有云：“纵横间之，举兵而相角。”这说明合纵、连横两条阵线的角逐，总是与军事行动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据此可见，对于“权谋谰诈”也还不能简单化地理解。

（2）过多渲染了刺客的个人恐怖、暗杀活动。如《赵策·豫让欲刺赵襄子》、《韩策·聂政刺韩傀》、《燕策·荆轲刺秦王政》，突出表现了豫让、聂政、荆轲三个刺客。这

三人既有“士为知己者用，士为知己者死”的共同点，又有不同点。但是不管怎样，作者着力表现他们，也就是认为凭个人的暗杀、恐怖活动可以改变时局。这显然是“英雄造时势”的唯心史观。

三

历代虽有不少学者对《战国策》的思想内容持不正确的态度，但对于《战国策》的艺术成就，特别是它的语言成就，却无不推崇备至，把它作为范本，认真学习仿效。

清人章学诚说：“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铺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文史通义·诗教上》）刘熙载《艺概》也说：“战国说士之言，其用意类能先立地步，故得如善攻者使人不能守，善守者使人不能攻也。不然，专于措辞求奇，虽复可惊可喜，不免脆而易败。文之快者每不沉，沉者每不快，《国策》乃沉而快。文之隽者每不雄，雄者每不隽，《国策》乃雄而隽。”这些评论，是很有代表性的。

《战国策》的艺术成就，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一）文辞优美，具有铺张扬厉、明快自如的独特语言风格。

文风的转变是与时代的转变息息相关的。由春秋进入战国，无论在政治上，还是人们的意识形态上，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影响所及，我们便可看到这两个时代的文学代表作在语言风格上的迥然不同。《左传》“曲而达，婉而有致”

的独特文风，是由春秋时代犹“尊礼重信”、“宗周王”、“严祭祀、重聘享”、“论宗姓氏族”、“宴会赋诗”、“赴告策书”等各种因素形成的；《战国策》“铺张扬厉、明快自如”的独特文风，是由战国时代一反传统的习俗，赤裸裸地陈述政治利害得失，斗争更加尖锐复杂导致的。

在《战国策》的“铺张扬厉、明快自如”的统一语言风格下面，再细加分析，还可看出流派风格和个人风格的差异性。

《战国策》产生在百家争鸣的时代，事实上它包括了众多学术流派的文章。纵横家人物苏秦、张仪，虽然一个主张合纵，一个主张连横，但他们属于同一个学术流派，因而他们的文章自然而然形成了共同的“铺张扬厉”的文风。鲁仲连、颜闾两人既有大胆干预政治的儒家思想，又有蔑视功名利禄的道家隐退思想，由于基本的政治态度、人生态度相同，他们的语言都具有一种潇洒自如的风格。

“风格即人”，或叫“文如其人”。《战国策》中众多谋臣策士的言辞，由于个性的不同，也就呈现出丰富多样的风格：苏秦追求功名富贵，其辞极力铺陈；张仪出尔反尔，其辞危言耸听；范雎交疏言深，其辞肝胆相照；蔡泽先声夺人，其辞辩丽横肆；甘罗童年出使，其辞锋芒毕露；不韦由商入政，其辞以利为先；黄歇游学博闻，其辞讲究用典；鲁连粪土千金，其辞洒脱自如；颜闾知足不辱，其辞刚柔并用；邹忌现身说法，其辞幽默风趣；触龙沉着老练，其辞曲折尽情；冯谖成竹在胸，其辞出人意表；庄辛拯救国难，其辞扣人心弦；虞卿效忠赵国，其辞单刀直入；唐雎智勇双全，其辞气势逼人；乐毅自明心迹，其辞不亢不卑；荆轲深入虎穴，其辞慷慨激昂。

《战国策》的文辞美，以及它的“铺张扬厉、明快自如”统一语言风格的形成，都跟作者极端讲究锤字炼句，考究使用排比、对偶、夸张、引谚、比喻、回环、设问、错综、颠倒、隐讳等多种修辞格式分不开。

先秦诸子的著作普遍爱用排比句铺写事物，而《战国策》则尤为突出。排比，是散文中常用的修辞格式，就是在行文中有意识地组织相同或相似的句式进行排列，不避意思相似，不拘字数多寡，以加强文章的气势。如《秦策·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一文，就有多种排比句式：有三句、四句、五句排比的，也有六句、七句、九句排比的。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曾指出：“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讲究对偶的骈俪文虽盛行于魏晋六朝，但其源却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的散文。《战国策》中已多有骈偶化的文句。对偶要求相对的文句字数相等，力避字同意同，以反对为优、正对为劣。如《赵策·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一文的对偶句很多：有四四对、五五对、六六对、七七对、八八对，也有二五与二五对、四四与四四对、四五与四五对、五五与五五对、六六与六六对、四四五与四四五对、四四六与四四六对，灵活多变。

夸张手法的运用，可使本来看似平淡的东西给人突出的感觉，造成历久不忘的印象。《齐策·苏秦为赵合纵说齐宣王》一文，就是以夸张渲染的修辞手法取胜的。描写齐国都临淄文化娱乐活动开展之广泛，说“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踏鞠者”；描写临淄街头人口之多，说“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这样去夸张渲染，确是说得天花乱坠，大大加强了文学色彩。

格言谚语多来自民间，辞约义丰，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哲理和生活经验的高度概括。《战国策》所写谋臣策士，相当普遍地注意使用谚语，而且运用得非常巧妙。比如“宁为鸡口，无为牛后”、“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以书为御者，不尽于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于事之变”、“日中则移，月满则亏”、“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毫毛不拔，将成斧柯”、“积羽沉舟，群轻折轴，众口铍金”等等。运用这些精粹生动的谚语，不仅可使思想内容升华，也可使文辞大为生色。

比喻，通常人们把它分为高级比喻和一般比喻两种。高级比喻是指有故事、有寓意的寓言，一般比喻是指譬喻。

《战国策》中的一般比喻，如：“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是比喻政治条件尚不成熟；“粟如丘山”，是比喻粮食堆积得很多；“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是比喻军队作战之迅猛等。这些比喻，都极为贴切，增强了形象的生动性和论辩的说服力。

至于回环、设问、错综、颠倒、隐讳等修辞格式，这里就不多说了。

（二）刻画了战国时期众多谋臣策士的生动形象，含有某些虚构成分。

一般说来，史传文学要忠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原貌，不允许任意虚构。《左传》、《国语》比较符合这种要求，而《战国策》则较为特殊。南宋晁公武早发现“其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郡斋读书志》）这说明它有虚构成分。近人胡怀琛更指出：“《战国策》原为史类之一书，由今观之，吾人可云，其书大半是小说。”至于是否“大半